一、诞生

我生于光绪二十六年（庚子）七月初一日，公元是1900年 7 月 26 日。

庚子年中国大灾祸，八国联军进占北京，西太后带光绪帝逃西安，就在此年 7 月。这期间，洋兵、义和团、中国官兵在那些地方杀来杀去，死人无数，自然有很多冤枉屈死的，照“六道轮回”的说法，我可能还是屈死鬼投生转来的，也许这种厄运还会从前世带来，以致今生今世有牵连。

有人相信，一个人的命运是由诞生日的时辰八字决定的。所谓“八字”就是诞生的年、月、日、时用干支来表示的八个字，它可以由命理专家根据古书（易经）或大圣人周文王说的道理来推算、分析、研究而预先测定这个人的穷通寿夭，富贵贫贱，一生的祸福得失，并教示趋吉避凶。推算命理，预言吉凶祸福的“算命”，是一种专门的行业，旧社会里人们大多相信这些算命者的话，也有人称他们具有哲理，甚至有些王朝的天子皇帝也极其相信，虽

然这些算命先生有很多是盲人。我的八字总也被去推算过几次，有不是我自己亲手经办的，是否应验，我不大清楚；也有我自己亲自去办的，当时我并不相信定命论，更不相信盲先生，原不过做戏好玩，所以也没有去核实检查，是否灵验也不关心。但是经过长时间岁月的推移，有时碰到遭灾遇晦的时候，便好像先前算命先生原也提到过的，几次三番这样的反复，渐渐好像这些无稽之谈的从命理推测出来的预言，变得越来越“像煞有介事”了，也真是太奇怪了，虽然我仍旧还是不相信定命论。

至于我的命运，不必经过卜占。开头，我就认为是好的，因为生日是初一日，即朔日。旧时大家一般都相信，男孩子初一诞生，女孩月半（十五，即望日）出世，都是金贵的命。我于月朔即初一日出世，而且是在太阳已经很耀煌的早朝，非好不可。母亲还说过，生我时好像有个太阳落在她怀里，这正同历史上所记载的有些王朝的开国创业帝王的那些祥祯瑞符一样，可能我福分极大，前途不可限量，虽然我没有想做什么皇帝，但总觉得自己是了不起，童呆的心里充满了自高自大。稍稍长大了些之后唱童谣，有一首关于序数的童谣，唱出——“第一,紫金冠；第二，中状元；第三，三皇帝；第四，四金刚……”又相信了第三的排行最好，我在兄弟姊妹里正好排行第三，看来一定是要同皇帝一样神圣、伟大了。这个三皇帝的讲法，不知有什么根据，我现在也只知道“三郎郎当”的唐明皇李隆基，他可能是行三的吧。这是一个多才、多艺、

好色而晚年受苦的有始无终的半截儿皇帝。还有一个是无赖流氓泼皮阿三朱温，朱全忠，是后梁开国的顶顶荒唐的混蛋皇帝。这种三皇帝有什么好呢？儿童唱歌谣原不过随口喊喊，我也真的把排行第三同皇帝联系起来了。

三岁那年我种了痘。那时牛痘还不大通行，种的是土法的天花。种痘后，痘子发不出来，体温高升，浑身发热发烧，大人们很担心，着急。天花是危险的，痘子发不出，医师也没办法。母亲抱着病儿奄卧在床上昏昏懵懵之中，忽然觉着像蚊帐被揭开来，一个穿红袍的大人，伸手进来抚摸孩子，她惊醒了。当然已经什么都看不见，但孩子却好像安静了些。随后，痘子也发了出来，热度也逐渐退了，危险没有了。痘子发得很旺盛，几乎点点连成片片，满脸都是脓脓泡泡，护理很小心，后来我也没变成大麻皮。母亲很相信这是天神佑护，一定是孩子福大命大。可能，我也受到这种思想影响，私下更加强了三皇帝的信念。

我家在浙江省海宁硖石镇西南乡下小镇集庆云桥的街市中段，属于小康水平的中等人家。父亲章言治，字廷敬，又号子明，因为考秀才时被取中，列在案首（第一名），受到人们看重，不久补了廪（称为廪生），而且被安排在杭州府学。但他考了几次乡试，却始终没有考上举人。开头他被有些大户人家聘请去做家塾的教读，去过杭州及附近的路仲里、屠甸寺等处，也去过南浔邢家教读，就是以教师为业。后来接受了康有为、梁启超提倡变法维

新的思想，去上海龙门师范读了一期速成师范科，可能是第一期，修习毕业后，在硖石开智学堂及海宁城中达材学堂等校担任教员，这样就在教育界做事，过了他的大半生。

母亲许宜先（或霓仙），乡间许家门前许幼巢长女。许姓是海宁望族，乾隆年间有个礼部尚书许汝霖是他们的祖先，海宁五大姓“查、祝、许、董、周”里的“许”即他家。这位礼部尚书被他们称之为“宗伯公”，以示尊崇。此时他家已不富裕，原来在震泽等地开设店铺都已歇业，已经很败落了，一般都是普通人家的生活水平了。不过名门大姓还有余光，祠堂里坟上公有的祭产像还不少，轮值到管祭产的一年，则是有较大收益的；姑娘们都可以嫁比较富厚的人家。母亲同胞有四兄弟三姊妹，她居长，被叫做大姊姊，因她巧慧干练，能为她们大家出主意、当顾问，得到大家的爱重，在闺中就有能名。大约那时在章家，我祖父章永锈名声很好，经商得法；父亲在十八岁就进学，被目为新秀、英才，因而攀下了这门亲事。母亲比父亲小一岁，比父亲能干、懂事，父亲则有点书生气、书痴，而且相信宋朝理学，规行矩步，老老实实，不知时务、权变，并且还有点不通时务的样子，也就是被称为正人君子老冬烘那样的‘好人”。

我诞生时，我家还是一个大家庭，父亲四弟兄及一个姊姊，他行八，是最幼小的，人称“八先生”。父亲这一辈的人是言洪行三；言润行五，字采卿；言滢行六，字子

英；言治行八。我家一份宗谱，取名字按谱上规定，以“世德作求、永言克昌、麟兆嘉祥、咸佐邦康”十六字为序，并且第二个字要有金水木火土的偏傍，依次排下去，金水木火土的次序，是取五行相生的意义。祖父一辈是永字，下个字要金旁，故祖父是永锈。而我们这一辈是克字，下面的字是木旁，故我名克标，我兄名克楷。是谱名，但现在都不按谱取名了。封建余毒扫除干净，极好。我的弟兄这一辈中，早已有人实行，我的子侄辈及再下的一辈更不必说。这里说到这点，是述说一种社会现象，并非宣扬门第观念。讲门第我家是很浅短的，只看从“世”字到我这一辈“克”字，也不过七世，以三十年为一世代，也不过二百多年，很短。山东曲阜孔府，到现在已经是孔夫子的七十几代灰孙子了，不可同日而语。我家是明末清初由浙江长兴县吕山迁来庆云的，何时迁来虽不可知，但估计总是在 1660 年前后，因为 1659 年夏反清复明的郑成功、张煌言联军入长江，取崇明，累破清军，克瓜州、镇江，进至南京近郊，六合、滁州、天长皆反正，各地响应义军，兵荒马乱，后来他们没有成功而退军，社会上一定乱纷纷而逃难。从那时到民国元年 1912 年是二百五十年，时间上还差不多。我家在海宁是外来的客户，是没有地位的。

我家在庆云街的房屋是祖父章永锈建造的，他经商赚了点钱，从乡村搬到街上来住了。原住的乡村，叫做“南章”，离街上也只有里把路，十分钟可到。搬到街上来，

是表示弃农从商，专门做生意，不干农活了。这房子是小镇集一般的前店后屋样式，我们一家四房都住在那里，前后是四进的房屋，靠街的店屋，开头只有一开间，后来买进了邻屋扩充为三开间，后面的是三开间及五开间以及披屋等等。一门四子，家里人丁兴旺。祖父打算再另外造一所住房给两家小房居住，已经陆续买了些砖瓦木石等建筑材料，不料他突然病故，计划没有实现。我父亲的结婚，还是因为要给祖父病重冲喜作解救，但冲喜无效，于是只好停尸做亲，先叫他们成亲，然后脱下吉服改穿丧服而办丧事。因此父母的成亲是匆匆忙忙，不尽礼数的，母亲常以此为憾。祖母陈氏太太，人还能干，认为幼子还小，要他们兄弟之间不分家，仍旧维持大家庭老样子，所以直到祖母故世之后，我的父辈才分家拆产分房分炊，那时我已十六七岁了，距祖父死已二十多年。大家庭生活复杂，不好处有，好处也有，可不必说，我也不明白，也说不清楚 。

那时，即我诞生那时，我家在庆云街上有三个店铺。住家外面是老店章泰兴号，经营纱（土纺棉纱）、花（棉花）、米、食油、饼（豆饼、作农家肥料用）、杂粮等等，归五伯父采卿管理。街道稍南首，有家经营南北杂货、腌腊鱼鲞、糕饼茶食、纸马蜡烛的店铺，叫南泰兴号，由堂兄克树管理，他是三伯父言洪的独子，三伯父已于早几年故世。还有一家叫北泰兴号，在街道北端相近大桥（即庆云桥的俗名，其实桥并不大）桥堍相近，经营着京广洋

货、胭脂花粉、陶瓷纸张布匹、家用杂货，是新开的，由六伯父子英管理。本来我家在海宁城里曾开设一家章同源号纸店，是他经管的，因蚀本而收歇了，因而再在庆云街开设了北泰兴号来给他管理，使他仍有个位置。六伯父曾读书进学考科举，是个贡生，所以可算是乡绅了，他喜饮酒，有点绅士架子，讲究小享受，无意再赶考场，坐吃一家店铺最好。乡绅人家兼做买卖顶通行。

我们家里还有点土地，一共二百来亩，水田都佃出收租米，供家里一年四季食用；桑地自家管业的有十来亩，因为家里养蚕。我们也不例外，而且还是一项较大的收益，饲养春蚕缫土丝，收入归公。那时多数还是土法养蚕，采茧子后自己缫土丝。土丝是可以出售或存贮的，还没有茧行收购蚕茧来烘干。养蚕、做丝，是妇女的一件大生活，一项重要工作。养蚕工作忙，大抵临时雇短时间的定期短工,女的叫“蚕娘”,男的叫“蚕忙役”,有习惯上规定的期限，大抵在清明节订好这种协定，到蚕事开始就来上工，这是我们乡间特有的工种。

我家雇佣工人，大约是一个管烧饭的浦家娘，还有一个管船的顾成元伯，可以算是长工，其他都是临时雇佣按日付酬的短工。我家有一艘坐船，作为交通工具，我们这里水网地带，没有陆上的车马，走路只有靠天生的两只脚，而到处可通的水道，就有各种船舶。普通人家不用备船，可以去船行借船租用，摇船大约同现在的人开车一样，人人都能摇橹扳桨的。家里自备了船只，使用方便，

就得有专人管理,就必须雇佣一个船工,他要照顾、收拾、看管好这只小船，夜晚也宿在船上。这种所谓坐船，是有舱棚的，没有棚的叫做赤膊船。一般临时载货可以用简便的赤膊船，但载人旅游要防雨天下雨，晴天日晒，就得用有棚盖的船，也叫坐船，还有人叫它网船、小网船的。我家有三家店铺，还有亲友往来，做客，清明扫墓，冬季收租等等，此船用的时候不少。用船时，只一个人摇橹是不够的，有时还要拉纤，都可以临时雇人，这些事反正船工成元伯都会料理，他同我们家里的人一样，每天在厨房吃饭，好像是家里一个成员，也帮助做零活，十分勤恳。

那时我们老家里每天总有几十人吃饭，三家店铺有学徒来取，临时雇佣的散工或在厨房间或在工作地吃，或在店铺中与店伙同吃，有时还有来客，要主人陪着吃，还得备酒。厨房烧饭工作分量不轻，是由各房媳妇轮流值班服务的。小菜由店里托伙计买好，但料理要主妇动手，出主意，作安排，当然会有女佣或大丫环相帮，但她们的负担也不轻松，所以旧社会旧家庭里的妇女，做好一个家庭主妇，也并不简单。我们这个大家庭的情况如此，可能不是典型的，而且只是一般中等人家，也许没有代表性。老家里不分家，但各房的情况也有不同。我们的父亲在外做教读工作，常不在家，只有母亲一人支撑这个家庭，没有经管一家店铺，钱财不大活络，因之，我幼时家庭生活也极为简单，几乎没有留下什么印象。这也许是因为我小时十分愚笨之故。

二、上学读书

六岁那年，我开始上学读书。是去一个私塾。那时我们乡下还没有叫做“洋学堂”的。虽然清朝政府已经正式下令废科举兴学校，但一下子难以推行下去，乡下地方，上学读书只有这种私塾好去。大户人家有家塾，他们请一位先生坐馆，教读他们的子弟，也常接纳亲戚朋友家的儿童来附读。也有几户人家合请一个先生来办塾的。也有教书的先生自己开个私塾招收儿童来教读的，称“书馆”。我读的这个私塾，就是这种性质的。学费叫做馆金，有让各家随意送，也有预先自己规定的，不一律。

这个私塾是庆云街道上惟一的书馆，只有一个老师。二三十个学生，年龄大小不等，用书各人自备，桌子坐椅也各自从家里拿去。私塾里惟一的设备恐怕就是那个写着“大成孔夫子至圣先师”的位牌了。这块孔圣人的位牌很重要，早上学生来向它鞠躬，傍晚放学回家也向它行礼，是维持私塾秩序的权威。有一张桌台供着这个位牌，学生对它绝对尊敬。

老师奚寿生先生是我六伯母堂弟，我应叫他舅父，因之上学只须去通知一声即可。但幼童上学是被当作一件大事的，有许多世俗的礼节，我也说不清。我上学时，穿新衣、戴新帽、着新鞋，由大人领着，提了两只篮头，一只里装粽子，另一只里装糕饼，还有一对红烛。先在圣人位牌台上点亮了蜡烛，把粽子糕饼作供品，我跪拜叩头；然后行拜师礼，对老师叩头；对同学作揖，行相见礼。那些供品撤下来，由老师分配给每个同学各人一份，多余的归老师所得。这些糕粽有口彩在内，“糕粽”就是“高中”，中秀才，中举人，中状元，连中三元都要这个“中”字，就以“粽”来取其谐音。糕饼也一定有状元糕、太史饼，意味着中状元、做太史公（即点翰林），云片糕意味着青云直上，桂片糕意味着蟾宫折桂，都是有名堂的。实际上是给老师和同学尝些甜头，送点好处，有点变相的行贿受贿式道。中国人间社会关系的奥妙，在这里也有无言的透露。

私塾里读的书，大家都知道“三百千千”，就是《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和《千家诗》。这些书都有粗糙的木版本子，那时乡下杂货店里也有出售的。我没有读过这种传统的蒙童用书，而是用了父亲从上海带回来的一册（时务三字经》，仍然是“三字经”的书名。这书他拿来时已教我念过几句，还记得开头是“今天下，五大洲。东与西，两半球……”等等以世界地理开始的，这些字句同“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等

等，我想小孩子是同样不能够了解也不感到兴趣的。在私塾里念过些什么书，我全记不清了。同学中也有念四书五经的，他们年纪较大些，可能也什么都读不懂，不过总也是高声唱着，是书声琅琅的。小孩子上学，原不过去寄存一下，省得他们在家里胡闹，名目上是上学读书，实际上家里大人也并不关心他们认得了几个汉字，这是旧社会送子上学的一般情形，家里对我的上学读书，可能也是这样的。字虽然认得不多几个，但在游玩方面因为有伙伴，得到了收益，很有发展，学会了相骂、斗嘴、打小架、角力、摸盲（捉迷藏）、猜拳、跳绳、踢毽子、打棒（一种游戏）、滚铜钱、着棋、赛跑竞走、攀援树木、掏鸟窠、捕鳅摸蛙捉黄蟮、唱山歌、拔河拉绳、比武打擂台……

私塾的破房子前方是个院子，长天井里有株桃树，桃树开花，红得好看，但不结果。有一株葡萄藤，攀挂在桃树上，缠绕了桃树的高枝，热天，葡萄挂果了，一簇簇，累累垂垂沉甸甸在茂盛的叶子中间躲太阳光。时而有只松鼠来偷吃。这是我读书时醒瞌的良方灵丹。那只松鼠不知从什么地方来，从对面瓦屋房上跳到葡萄丛中，在繁茂的叶子荫蔽之下，啃葡萄吃，用小尖的嘴去咬，用前脚去拨弄，有时从叶丛里露出头来，有时翘起一条大而长的尾巴，十分得意十分开心，但葡萄被糟蹋了。这丛葡萄好像没有主人行使所有权来采收果实，正好供松鼠享用，而且只有一只松鼠独家专利，恣情受用，真是有福的畜生。既没有别的松鼠，我们的同学也没人去跟松鼠争食，松鼠得

意了好多时，直到葡萄被弄光烂光才罢休。松鼠采葡萄，是中国画的一个常见的题材，是一幅绝妙的国画，想不到我幼小时候倒会欣赏国画艺术的，不知为什么年纪大起来反倒什么也看不懂了，既不懂风雅也不知艺术为何物。这样说起来，幼小时的无知，乃是大知了。

各种游戏玩耍当中，我最感兴趣的是打擂台。那是在放学之后，几个人相约先不回家而到街西北的坟墓地去嬉。那块地较宽大，有些松树、柏树，有四五个坟墩头，堆土各四五尺，不很高，我们谁都可以在那里跳上跳下，大显身手，耀武扬威。占据一个坟头顶上，摆开架式，立作山头，不让别人夺去，保卫自己的江山，别人也存心要来攻夺的，而且还不只一个人攻上来，于是展开激烈的攻防战，这就是我们的“打擂台”游戏。守卫不住被人推拉了下来，就是失去了山头地盘，得让位于胜利者去做台主，再由别的人去攻打。打擂台的人，可多可少，如果人太多，太拥挤也不好，可以分开来另外再设立一个擂台，反正坟头有的是，尽可以开疆拓土，再造一个独立王国。打擂台不论胜负都要得人心，如果当了台主，空守着坟头没有人来攻打，他就是最大的失败者了，因为做不成游戏了。游戏是群众共同进行的，因而是十分民主自由的。看来，凡是集体群众共同的事情，必然要有民主与自由。

打擂台是出劲出力的，总要年纪差不多，体力相仿佛的人集在一道才好做。如有年龄长、力气特别大的来参加，没有人能敌他，就打不成对抗，没有趣味了，一定要

势均力敌、旗鼓相当才有劲。大概，什么比赛都是这样的吧，实力程度太悬殊，用不到比赛就可决定胜负，何必多此一举。但事情并非刻板一块，有的游戏也可以允许年长力大的人来参加在群小之中，比如我们有一种叫“人压人”的游戏，许多人打堆来压倒在下面的人，让他不得翻身，那时最好被压在底下的是个大力士，他可以一翻身把压在上面的群小掀开而脱出来，他实力强大，许多人合起来也压不倒他，被封为大力士，“人压人”的把戏推翻了，大家哈哈大笑而散。

种种游戏我们可以创造出来，层出不穷，这样我在私塾里读书少，玩耍多，稀里糊涂日子蛮好过。到了九岁那年，就不能再这样继续下去了，我被安排到斜桥镇读小学。斜桥离庆云有六七里路，沿着塘河一直走就可到，平常走三十分钟，沿河一条塘路极便，但对于九岁孩子，却不是那么简单了。斜桥这个镇集比庆云大，因而先开办了小学，就是当初被叫做“洋学堂”的。因为父亲的朋友董砚香先生在那里教书，所以要我到斜桥去读。那是不可能早出晚归走读的，要寄宿在校里，一日三餐在那里吃。父亲去了解过学校可代办食宿，因此做了这个决定，认为日常生活九岁孩子可以自己料理，而且也是一种锻炼，我也模模糊糊，莫知莫觉地去了。当时有旁人闲言闲语，说不应该让这样小的孩子离开家，既然父亲自己在外边教读，要出外，带在身边不是更好？这样的责备也言之成理。但是带了孩子去教读，父亲已实践过了，大哥克楷就是他带

了去屠甸，后来又去硖石的。有过这个经验，大概认为不很理想，所以又相信了古人的“易子而教”的办法，认定教育子女必须假手他人，而这次他信托了董先生，相信他可以托付的。母亲对此，没有成见，她对儿女并不溺爱。

斜桥是沿河的一条长街，东西两个环洞桥之间，约有四百米街道，中间还有条石桥叫中石桥，市街在河北岸，河南岸还是桑地田亩一片农村景象，仅西环桥那里有些住房和市梢小店，那里往南去有小河及小路通往郭店及海宁州城里。斜桥小学设在市中心地段的关王庙“显圣庵”里，与中石桥相近，占用了后面的庙屋，原来供奉的泥菩萨被集合在墙边，用竹篱笆芦扉拦起来，空出了屋子来做学堂，天井里的大门关上了，和外面的关帝殿隔绝不相往来。小学的大门在显圣庵旁侧，里面是一个魁星阁，是楼房，魁星阁叫了阁，就要有楼的吧。这个魁星木料雕像很有点威武可怕，还供在楼上，他是被说成掌管天下文事的，同学校有关系所以其阁也就被充作校舍了。我的床铺就搁在这里的前楼房里，夜里在此安歇。读书地方在东侧的显圣庵后埭，成了一统三间的大房，也没有用板壁隔开，空空荡荡的不成为教室样子，既没课桌，也没黑板、讲台，其实完全还是一个私塾的款式，学生也是七零八落地散坐着，可能桌椅之类也是各自从家里搬来的。另外天井东侧一个过路偏间，有西向的短窗和一扇小门，这一小间是另外朱家的几个学生的读书房，其中有朱玉堂的儿子文琪、文俊等人，程咏春的两个儿子程云波、程六嘉则是

在外边大间里和我们一起的。这两户人家是斜桥的绅衿，是我后来才知道的。

这个称为小学，被叫洋学堂的，共有三四十个学生，不分年级，不排课程表，没有作息时间的规定，没有一定的教科书，用不到打钟或摇铃来指示上课下课，一切照老式学塾办法，因为董先生原只是一个老童生，年纪相当大，已有五十多岁了，根本不知道学校教育是怎么回事。大概当初草创开办学校有很多是这种情形的吧。教课还是以老师个人亲自教读为主，有不少人还是读四书五经的，因家长欢喜，老师照办。学生多，老师一个人照顾不到，所以对于幼小的学生，由老师委托几个较大的学生去照管，教他们识字、写字等课目，大的学生做了小先生。照我的年龄是可以由小先生来管的，由于父亲托付，董先生还是亲自对我教读，这是特别照顾的。读的什么书，我也记不起来了，只知其中有一本是商务印书馆出的中国历史教科书。我还记得有黄帝元妃嫘祖，始教民养蚕什么的记述，此外一无所忆。

学校后面有条小河隔开，是一片广大荒野，有坟场土墩草地树木，我们靠河房间边有座小桥可以通过去玩，那是我课余的乐园。可惜朋友不多，这里都是斜桥本地学生，我陌生，他们又一下课就回家去。惟一的同伴，是住读的陈天庆兄，他是从骑塘桥来的，大约比我大一二岁，人也老实，不敢欺侮我。我依然是嬉戏多于学习，常到校门外去玩。学堂大门对面有一家姓张的，对我很好，有个

大朋友名字叫张少卿，常邀我去他家坐谈，小孩子谈什么呢？全忘了。还有一个邻居提篮卖零食的叫吴阿毛，也很和气，他住在庙的那一边，每天下午提了满篮食品出来卖，多去茶坊酒店做生意，他卖的是野味、鸟屑、爆鱼、牛肉之类的下酒物，也有较价廉的五香豆、豆腐干、花生、素鸡之类，我没有买吃过，但吴阿毛认识了我，见了面总打招呼。

显圣庵这座关王庙前面保持原样，大门敞开，善男信女可以照常去烧香拜佛、虔诚信佛的乡下老太太们每逢朔、望及节日或什么菩萨、神道的诞辰，常有念佛、拜忏或宿山的行动，我可以去随喜、参观、瞻仰，也算白相游玩。关王大殿前面是大院子，对着一座戏台，戏台就在大门口，所以这庙似乎正中没有大门，因为空间被戏台占了去，只有两旁开的大门。戏台上常常有草台班子做戏，是人家还愿或节日、社日，于是农民伯伯和农村青年来看戏的很多，大有市面，摊贩小商及卖零食吃的极多，十分闹猛，我们也就出来看戏，与众同乐，很好。不过人小身短的我，实在是看不到戏的，只见红衣人进、绿袍人出，刀枪棍棒挥舞，锣鼓喧天，十分热闹。热闹就好玩。关王庙还有出会，就是抬了泥塑木雕的菩萨出巡，走许多路在乡村里兜圈子，据说是去消除瘟疫和天灾，以保护人民得到五谷丰登，人世太平。那是更热闹的盛会了。乡间村坊上多数有组织参加迎神赛会，出故事、台头，是民间一件大事，但至多每年只有一次，也有不举行的年头，因为总要

花费些钱，一定要农家有余钱的才好举行。这种迎会，当然更加好白相了。在斜桥期间好似没有遇到这种好机会，但跟了巡回的路走一圈去看会的事，后来我也有过好几次，都是十分满意的。

董先生对我是尽量照顾的，星期日没课，我早上就到他家。在学堂不远处街上，他租住一间房屋，董师母为我梳头发打辫子，儿童头发不整，梳理费工夫，平日我也不关心到辫发，看来这也是件必要工作了。师母很和气，也五十多岁，不知她平时是否念佛烧香，在家里看不出来，房里板壁上大张的年画，好几幅，有胖娃娃大鲤鱼，也有成套的通俗故事，这些定是桃花坞或杨柳青的出品，是用石印方法印五彩的，内中有一张《珍珠塔》的故事，她讲给我听了，什么方卿唱道情，什么陈翠娥哭塔，都极有趣，并还知道了做强盗的叫邱六乔。她同董先生两人过活，不知家里还有没有别人，也不知道他们有没有子女，老先生鼻头稍有点赤，也不知道他是不是爱饮酒。看去家无长物，生活清苦是肯定的。在先生家里我待不长，觉得有拘束，不如在外边玩耍自由自在。

那时沪杭铁路刚造好，可能已经通车了。斜桥有火车站，那种式样的房子叫洋房，砌好砖头不再粉石灰，砖头是红的很特别。我常常到火车站去玩，一个人或同陈天庆一道，都是从学堂后门过桥从荒野地里斜过去，在坟场后边有小村庄叫于家场，只有十来户人家，再北向几十步就到火车站了。这是条没有路的近道，正式的路要走浜底头